

主编 黎文森 段宗志 陈鹏

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

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

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

主编：黎文森 段宗志 陈鹏

浙江大学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10号

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

黎文森 段宗志 陈鹏 主编

责任编辑：刘培华

特约编辑：凤一鸣

题 签：孙献忠

装帧设计：韦君琳

●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安徽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字数：152千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ISBN 7—308—00868—1

C·074 定价：3.25元

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

主 编：黎文森 段宗志 陈鹏

副主编：蔡云辉 李宝昌

撰 稿（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贤来 支 越 任雪萍
李宝昌 汪文杰 汪明志 陈 鹏 陈春子 段宗志
张华升 郭 敬 雷国瑜 黎文森 蔡云辉 雍成汉

2003/11

序

历史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由紧张趋于缓和，由对抗转为对话，由两极变为多极，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主流。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国际敌对势力从未忘记用武装干涉和平演变来达到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特别是近年来，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了暂时然而巨大的挫折。西方资本主义力量则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这一“良机”，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和平演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反动势力破坏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和平演变的悲剧已经发生了。而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要有精神准备成为国际敌对势力攻击的主要目标和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重点。因此，我们切不可丧失警惕，必须牢固确立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观念。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打好反和平演变这场战争，首先必须对和平演变战略的有关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一书，正可以满足我们的这一愿望。据了解，自1989年政治风波以来，有关和平演变问题的介绍、研究文章出了不少，但是专门就这个课题展开集体攻关，最后形成一本十几万字的专著，目前国内尚不多见。《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编著者们敏锐的政治嗅

觉、严肃的历史使命感和执着的理论探索精神，无疑是值得我们首先推重的。

当然，推荐这本书不仅因为它在名义上是填补空白之作，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全面。该书从和平演变战略的产生和发展，到战略的目标、内容和手段，从和平演变战略在80年代的实施，到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都作了系统全面的阐述，有助于我们从全貌上把握有关和平演变战略问题的基本内容；二是新。该书在材料的运用、观点的择取等方面，吸收、综合了国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将和平演变战略在当代推行的最新情况介绍给我们，使该书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三是通俗性与专业性兼顾。该书有观点、有材料、有分析、有预测，在一般的通俗读物和难读的理论专著之间走出了一条中间道路。

由于以上的特点，《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一书，将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面。我们欣喜地等待着广大读者阅读这部佳作时的热情反应。

是为序。

孙献忠

1991年6月于安徽大学

目 次

第一章	和平演变战略的产生和发展·····	(1)
第二章	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原则·····	(23)
第三章	和平演变战略在80年代实施的条件·····	(41)
第四章	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突破口·····	(59)
第五章	和平演变战略的手段·····	(77)
第六章	和平演变战略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107)
第七章	反和平演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 重大历史任务·····	(118)
第八章	挫败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对策·····	(146)
附录(1)	近代以来美国对外侵略录·····	(176)
附录(2)	美国侵略朝鲜战争·····	(181)
附录(3)	美国侵略越南战争·····	(183)
附录(4)	具有反面价值的姐妹篇 ——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 和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	(184)
附录(5)	1956年匈牙利事件·····	(189)
附录(6)	“布拉格之春”·····	(162)
附录(7)	剧烈动荡的1989年的东欧·····	(194)
附录(8)	惊心动魄的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	(204)
后 记	·····	(208)

第一章

和平演变战略的产生和发展

一、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

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和发展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统天下，使它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因此，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是帝国主义势力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帝国主义势力曾经多次联合起来，妄图用军事手段消灭社会主义。而当军事手段遭到失败以后，他们便改变策略，转而突出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妄图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和平演变战略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它从提出到实施有着一个酝酿、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

（一）和平演变战略产生的历史背景

和平演变战略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世界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和平演变战略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和社会主义制度经过长期复杂的较量，而屡遭失败以后，被迫采取的一种战略。

作为和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及社会制度对立物的科学社会

主义思想体系及社会制度，当它刚刚出现在地球上的时候，就预示着整个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取而代之。由于阶级利益的对立，国际帝国主义极端仇视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看成是他们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障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因此，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首先诉诸武力，从1917年到50年代初的30余年间，曾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三次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妄图一举将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扼杀于摇篮之中，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1917年，当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地球1/6的土地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英、法、日、美等14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俄国内部反革命势力的配合下，从1918年开始，先后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动了武装干涉。刚刚获得解放的俄国工农群众，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英勇反击帝国主义的入侵。几十万工人农民自愿加入红军，约占总数一半的党员和青年团员开赴前线。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打退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东西各条战线的进犯，丘吉尔吹嘘的“14国进军”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次经受了巩固新生政权的严峻考验。

1939年，德国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长驱西进，但它的最终目的就是消灭东边的社会主义苏联。在这之前，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对希特勒的侵略行径采取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并于1938年9月同德、意两国首脑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妄图将这股祸水东引，达到借希特勒之手扼杀或削弱苏联的目的。当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

侵犯条约，分兵三路，投入大量兵力，实施其蓄谋已久的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莎计划”时，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领导下，奋起抵抗，打击侵略者，以巨大的牺牲粉碎了帝国主义的阴谋，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至此，社会主义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出苏联一国的范围，相继在欧亚大陆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这是继十月革命之后世界现代史上又一伟大事件。正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时候，美帝国主义悍然纠集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于1950年6月25日，发动侵朝战争，并把战火燃烧到中国的鸭绿江边，妄图以朝鲜为跳板，一举消灭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面对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中国人民表现了大无畏的英勇气概，义无反顾地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命令，跨过鸭绿江，与朝鲜军民一起，迎击帝国主义的挑战。经过近3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把美国侵略军赶回三八线以南，迫使美帝国主义签订了停战协定，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侵略战争的失败，使得美帝国主义妄图以武力干涉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彻底破产。国际帝国主义在历史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用赤裸裸的武装干涉、武装侵略的手段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是难以奏效的。因此，它们不得不调整战略，在不放弃使用武力干涉的同时，特别注重使用和平演变的手段，以实现它们妄图颠覆、消灭社会主义的既定目标。

（二）和平演变战略的思想渊源

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是在50年代初提出的，但其思

想渊源却可上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早提出和平演变思想的主要人物是曾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长期任职的驻苏代办、被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一些人捧为苏联问题专家的乔治·凯南。从1945年开始，他多次表达了要对社会主义苏联进行遏制的思想。1945年5月，凯南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关于《对德战争结束前夕的俄国的国际地位》的报告。1946年2月22日，他给美国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1946年2月22日备忘录》，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作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首次提出“遏制”苏联战略的理论和政策。凯南认为，苏联对外部资本主义世界有一种“传统和本能的不安全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美国不可能“同苏联享有政治上的亲善关系”，“美国和苏联是对手，而不是伙伴”。凯南提出，苏联的政策目标是力求分裂和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并在一切合乎时机和会有好结果的地方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他主张用“遏制”手段，即除战争以外的所有手段去“围堵”苏联，使苏联改变政策并使其发生内部蜕变。他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是以一种对苏联扩张政策的长期而有耐心、坚定而警觉的遏制”，“在苏联可能危害西方国家利益的任何地方，坚决与之对抗”，进而促使苏联“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性质”，使之逐步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这份报告受到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重视，美国国务院把此文转发到各驻外使馆传阅，并在报刊上透露其主要精神，凯南的电报为美国遏制苏联，发动“冷战”的政策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1947年7月，乔治·凯南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又发表了题为《苏俄行为的根源》的文章。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助手克拉克·克

利福德根据杜鲁门的旨意，提出了《美国与俄国》的绝密报告，宣称美国当前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美苏关系问题，也主张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凯南和克拉克的上述思想和言论，形成了对苏联进行“遏制”战略的理论雏型。自此以后，美国由长期关注本土安全为主的战略转变为以苏联为主要对手的全球争霸战略。

差不多和凯南拟写“备忘录”（电报）的同时，1946年3月，英国首相邱吉尔匆匆飞到美国，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于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反苏演说，即所谓的“铁幕演说”。他说，“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第五纵队到处构成对基督文明的日益挑衅和危险”，声言“趁今天还为时未晚”，西方“要考虑尽速在一切国家为自由和民主创造条件的问题”。他以迫不及待的心情向美国和西方呼吁“现在需要的是作出解决问题的安排”，即加强军事实力，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苏反共。他的“铁幕演说”揭开了战后东西方“冷战”的序幕。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国情咨文》，正式抛出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进行“遏制”的“杜鲁门主义”。他宣称，世界已分为两个敌对的营垒，美国政府“决心承担无限的责任”，来援助“自由世界”，并对“极权主义国家”发动一场全球性的、意识形态的“圣战”。据此，杜鲁门政府拟制了一个用非军事手段促使苏联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的“遏制”战略。要点有三：（1）实现马歇尔计划（即欧州复兴计划），通过提供经济援助复兴西欧、日本经济，恢复欧亚大陆力量对比的平衡，加强美国在欧州的影响；（2）在重建西欧、日本的同

时，利用“民族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发展，从内部削弱共产主义；（3）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基础上，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促进苏联改变对国际关系准则的看法。195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第68号文件，指出“遏制”就是用除战争以外的所有手段去“围堵苏联权力的进一步扩张”，同时特别强调这种“遏制必须以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并随时准备使用为基础”。

在对苏联进行遏制的同时，第二次大战以后，中国革命的磅礴气势和迅速发展，也使西方资产阶级看到了遏制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49年7月2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信美国总统杜鲁门，建议制定一种新的政策，鼓励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推翻共产党。同年8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强调要鼓励和培养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使之“东山再起”，施展其自由主义的影响，促使未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凯南的“遏制”理论还是艾奇逊的培养“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图谋，虽然表达各异，但都贯穿着要用战争以外的手段颠覆以至消灭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们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和平演变”的战略，但已经为后来形成的这种战略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基础。

（三）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

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进一步发展成为和平演变战略，是50年代初的事。1950年，作为共和党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的杜勒斯，在他口述的《战争或和平》一书中，认为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在进行一场思想战争，而且正遭受一种用军事力量无法挽救的失败。”他认为：“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和巩固进展得很快，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对世界斗争的这一方面漠不关心和没有能够有效地进行这一方面的斗争所造成的。”为此，他主张重视“冷战”的研究和工作，“发展特殊的技术”，鼓吹“必须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1953年，杜勒斯在美国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所作的证词中，提出要用“更为有力或更为主动”的“解放政策”来取代那“无效的遏制政策”。他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称为“被奴役的人民”，鼓吹必须时刻记住这些“被奴役的人民解放问题”，主张用“和平的方法”达到这一目的。他认为，“用和平的手段取得胜利”是西方对付共产主义的“高尚战略”。

为此，杜勒斯一方面大力实施“解放政策”，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宣扬，继续完善和发展这种政策。杜勒斯声称：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存在是“历史上的永久事实”，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存在的这一事实“不是不可改变的”，而且“发动真正的和平攻势的时机已经到来，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发动了和平攻势”，因此，“我们不必害怕苏联统治者声言愿意进行的和平竞赛”，“必须大胆地行动”，在美国的领导下，缩短共产帝国的预期寿命”。1956年，杜勒斯乘我国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之机，在一次国策声明中宣称，美国的政策是要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自由主义化和资本主义化），并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国家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

1953年10月，杜勒斯飞抵台湾，亲手策划制定了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具体政策。事后他说：“我去福摩萨台北呆了3

天之后于昨天晚上回来，我们在那里根据我们的共同防御条约同中华民国政府进行了磋商”，“远东的所有自由国家都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所以“必须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的精神”，“用行为和榜样来支持大陆中国人的思想和心灵”，“使大陆上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

杜勒斯的解放政策提出后，被艾森豪威尔政府所采纳，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支柱。至此，一个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战略在杜勒斯手中已经初步形成。如果说凯南是对苏联“遏制”理论的开山鼻祖、艾奇逊是对华和平演变战略的始作俑者，那末，杜勒斯则把西方资产阶级用和平方法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加以系统化、政策化，从而成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炮制者。

二、和平演变战略的发展

杜勒斯的“解放战略”的提出，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已作为一种战略而出台。但是，它成为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主要的、全球性的战略则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其间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一）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的15年间，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形成阶段

如前所述，和平演变战略是50年代在杜勒斯手中初步形成的。但是，它的最终形成还是在肯尼迪、约翰逊统治时期。肯尼迪、约翰逊、腊斯克等人对杜勒斯提出的和平演变战略

不断充实发展，最终形成了较完善的“和平演变”战略。肯尼迪根据杜勒斯的“解放战略”在1956年波匈事件中没有表现出“解放东欧的能力”这一事实，批评它是“空话和幻想”。他上台后，根据现实对原来的政策进行了较为灵活的策略调整。他抛弃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解放政策”中某些过时的东西，发展了他们一直坚持的和平演变的思想，用“和平竞赛”代替“解放”，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和平战略”。他宣称，美国不但要象杜勒斯那样“高谈解放”或和平演变，而且要制定执行这些措施的计划，采取具体的措施。根据“和平战略”的构想，肯尼迪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制定“灵活的反应战略”，以加强军事实力为基础，进一步加强与苏联的全面争夺；通过和平演变把东欧国家纳入“自由世界”的范围，在美国的领导下，以西欧为主建立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继续加强从日本、南朝鲜到印度的对华新月型包围圈，加紧对亚非拉地区的侵略和控制。他强调美国要建立常规力量和战略力量优势，使美国拥有一切手段，对一切类型的战争都能做出“灵活反应”，以全面的军事优势“遏制”共产主义，使“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逐步实施。肯尼迪把东欧国家视为苏联“铁甲上的脆弱部分”和一个“能在它的整个体系内散布独立性的潜在的炎症根源”，提出“必须立即动手”，“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根据这一战略，美国政府一方面在越南发动了一场“特殊战争”，并下令封锁古巴，迫使苏联撤出导弹装置；另一方面，展开了对东欧国家的和平攻势，利用援助、贸易、旅行、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及资金和技术等所谓“搭桥”活动，有区别地加强了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薄弱环节的和平进攻，把和平演变

的思想贯彻到了美国对外政策和交往的各个方面，使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至人权等活动都成为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

由此可见，肯尼迪的“和平战略”一面强调用冷战政策、军事手段来遏制共产主义，另一面又主张通过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竞赛”，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和平演变，它实质上是“一手拿箭，一手拿橄榄枝”的战略，是一种典型的软硬兼施、反革命两手并用的战略。可以看出，在肯尼迪的和平战略中，第一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实施和平演变的政策和措施。

在这一时期，作为肯尼迪政府的国务卿腊斯克也积极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出谋划策。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应该是：“谋求建立一个自由与独立的国家组成的和平的世界大家庭”，“并继续寻求把共产党拉入这个大家庭的办法”。为此，他总结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遏制”、“围堵”及“解放”的经验和教训，设计了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宣扬有意识的接触政策，即“和平渗透”思想。他主张利用一切方法来“促进”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他继承了和平演变战略中软硬兼施的传统手法，主张“以实力为后盾去谈判”，极力鼓吹传播“自由思想”。他说，美国愿意尽可能地鼓动共产党世界内部的“走向民族主义和个人自由的趋势”。根据这样的目标，他制定了推行目标的策略：“做我们所能做的事来鼓励共产主义世界向民族独立和开放的社会演变。我们赞成铁幕之后的人民同我们自己的人民进行更多的接触……”。

腊斯克的“和平渗透”的主张与肯尼迪的“和平战略”互相配合，相得益彰，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和平演

变战略进一步趋于完善。

1963年肯尼迪遇刺，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他继承肯尼迪的衣钵，继续采取同苏联、东欧缓和的政策，奉行和平战略。1964年3月10日，哈里曼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发表演说，强调和平演变是一种缓慢而可靠的实现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办法。“美国的政策是利用现有的一种和平的接触借以鼓励现在正在发生的演变……”。根据通过和平接触促进演变的构想，约翰逊曾经考虑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谋求同中国建立关系。1966年，约翰逊就亚洲和中国问题发表声明，宣告美国要坚持同中国大陆进行人员交流的政策。

综上所述可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肯尼迪——腊斯克。如果说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解放战略”使和平演变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种战略首次提出的话，那么，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及腊斯克的“和平渗透”思想则比较完整地提出实施和平演变的具体措施，从而使和平演变战略最终形成。

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是以军事对抗、东西方对峙为特征的紧张“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营垒的关系泾渭分明，彼此对抗，军事对抗是居第一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采取军事遏制政策，试图通过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和侵略等手段遏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则针锋相对，进行了坚决斗争。

因此，在这一时期和平演变战略虽然已经形成，但并没有具体实施，还未能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总战略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我们可以这样概括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特点：（1）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已经有